

〔法〕巴特里克—瓦日芒著

缓和的幻想

商务印书馆

缓和的幻想

〔法〕巴特里克—瓦日芒 著

丁世中 杜宝群 王正瞳 译

丁世中 校

商务印书馆

1980年·北京

L'ILLUSION DE LA DÉTENTE

Patrick Wajzma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缓和的幻想

(法) 巴特里克—瓦日芒 著

丁世中 杜宝群 王正瞳 译

丁世中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1/32 9 1/2 印张 194千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册

统一书号: 3017·251 定价: 0.74元

目 录

引 言	1
志 谢	4
第一部分 永恒的因素：意识形态	5
第一章 和平共处在结构上的模棱两可	6
第二章 同资本主义阵营政治、外交关系 的暧昧不明性质	52
第三章 苏联的意识形态	64
第四章 汇合论的批判分析	77
第二部分 暂时的因素：外交环境	89
第一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东方政策	89
第二章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	124
第三章 中欧裁军和削减军备	135
第三部分 欧洲的选择：威胁与前景	147
第一章 西欧的不安全因素	148
第二章 对西欧国家日益增长的不安全 感提供可能的补救办法	179
注 释	210
附 件	264

引 言

“七十年代”对于欧洲安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和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

威利·勃兰特自 1966 年起，在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大联合的政府里任外交部长，旋即于 1969 年任联邦总理（时为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从这时起，他就强化“向东方开放”政策，并因而弃绝了此前各届政府所依据的外交原则，即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政治现状和领土现状；愿意将重新统一德国看成同东方长期搞缓和的一种值得欢迎的结果，而不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从 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到 1969 年，苏联在对西方政策、特别是对德政策方面，表现得并不十分活跃。

但是，苏联在 1968 年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干涉，西方阵营对此反应淡漠；莫斯科在战略方面取得了进展（1969 年，在洲际导弹的数量方面，莫斯科“赶上”了华盛顿）；苏共第一书记的个人威望不断增长。这些因素都增强了克里姆林宫对自身实力的信心，于是从 1969 年秋季起，促成它推行极为“活跃”的外交；先后历时不过数月光景，莫斯科在抵制两年之后，同意与美国开始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它终于响应了勃兰特总理的倡议（1970 年 8 月签订德苏条约，并打开同华沙、东柏

林和布拉格缔约的局面)；开始了关于柏林问题的四方谈判；重新提出东方的那项老方案，即召开欧安会……。此外，在1971年春天，克里姆林宫还似乎准备接受西方建议，进行关于削减欧洲驻军的谈判。

1969年1月，理查德·尼克松上台以来，美国试图实行一种较为收敛的外交政策(即所谓“低姿态”)。这种“尼克松主义”的基础，是对美国国家利益较为现实的、不那么“救世主式”的估计。如果吉米·卡特也予采纳，它就只能起一种损坏作用，损坏华盛顿与盟国、特别是与欧洲盟国间传统一致的利益关系。

以上各种因素(苏联向西方开放、联邦德国向东方开放、美国搞有限的脱离接触)的结合，导致对西欧安全产生了两点主要疑问：

——苏联同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各种谈判，到底在追求什么目的？克里姆林宫接受勃兰特总理的东方政策，其主旨不正是为了对联邦德国与其欧洲盟友进行分化瓦解吗？它建议召开欧安会，不正是首先图谋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吗？它打开同西方的许多谈判“渠道”(例如：同美国谈判限制战略武器；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谈判德苏条约；同西方三大国谈判柏林问题；以及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范围内分别同上述各国谈判)，不正是企图利用大西洋联盟各成员国相互间的分歧吗？

——欧洲人如何才能防范美国外交“新政”带来的危险？

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可归纳为三条主要线索：

1. “缓和”被莫斯科利用，主要为“策略性”目标服务。

2. 同表面现象恰好相反,苏联及其卫星国自七十年代初同西方签订的各项条约与协议,并不标志着克里姆林宫的动机“纯正”。

3. 对西欧的种种威胁(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意图暧昧可疑;苏联在中欧加强军事实力;美国外交全球性的脱离接触倾向;美苏间的核勾结,以及双方联盟的传统作用发生变化)不应使欧洲人退却,而应使之成为共同探求获致最大限度安全的手段。

志 谢

致谢小启：作者谨对斯杰凡·德·孟德尔松先生的卓越合作表示诚挚谢意。他的钻研精神、极为可靠的判断力以及批判态度，对作者始终是弥足珍贵的帮助。

“我拥抱自己的对手，但目的在于将他扼死。”

引自拉辛著悲剧《布里塔尼库斯》第四幕第三场

第一部分 永恒的因素： 意识形态

如今，损害未来欧洲安全的是一种不安局面。究其原因，则不仅在于形势不可避免的摇摆，而且牵涉到苏维埃国家的本质：它是一个“世界规模的国家”，面对着“由许多国家组成的世界”¹。

欧洲安全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概念，主要原因是：它从属于东西方关系，而对东西方关系的分析却建立在把“缓和”同“和平共处”混为一谈的基础上。“缓和”不过是冷战时期东西方紧张局势的减缓而已。它是词义学上的花样翻新，旨在表达1962年秋古巴导弹危机解决以后国际关系表面平静的那种“气氛”。这个“想当然”的概念，不会有太大的用处。

与此相反，“和平共处”²却是一种非常确切的观念，它表达不同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就西方人而言，它只是把个人意见多样性的价值，移用在国际关系上³，但若就苏维埃学说而言，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不可调和的对抗——在特定历史时期——一种非战表现形式。所以其基础便是“不可调和”这个关键性概念。“列宁主义关于和平共处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秩序的任何宽宥，它不是走向永恒的通行证，也不意味着国际关系中田园诗时代的来到。不以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也不管

它们怎样疯狂抵制，新生社会秩序同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秩序间的斗争仍在继续，并根据具体情况……而日益尖锐。和平共处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路线，充满了同帝国主义积极斗争的精神。⁴在意识形态这样敌对的背景下，何至于竟看不出：同苏联人合作实现旧大陆安全的企望是多么靠不住？欧洲的平衡竟建立在这样一种原则之上——它恰恰以争取对立的两大阵营之一最终战胜对方来否定该原则本身，——其命运与价值又当如何呢？

第一章 和平共处在结构 上的模棱两可

两大阵营论

某些作者断言：和平共处理论产生于 1956 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另一些作者声称：列宁于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即起草的和平法令⁵中，即已有和平共处理论的萌芽。这方面，在马列主义各注家的著作中，可找到足以进行无休无止语录战的资料。无论如何，对苏联领导人而言，主要并不在于该理论的出处，而在于它具有长远意义。从列宁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历来——其间小有差异——把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理论仅仅解释为一种实际需要，这种需要由当时历史环境所决定，并永远摒除敌对阵营相互调和的一切念头。

看来任何其它解释，都经受不住对苏共历届党魁各种声

明的分析。

赫鲁晓夫之前时期

早在1919年2月，斯大林就毫不含糊地提示：“世界已经确定不移地分裂为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阵营的斗争，是整个现代生活〔完成其‘革命’所环绕〕的轴心”⁶，过了不到一个月，列宁也决意大力强调两者的不可调和性，他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国家、而是在整整一个国家体系当中，而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国家的长期共处是不可思议的。不是这一阵营便是那一阵营，最终总有一方战胜另一方。”⁷这一声明发表在西方对俄军事干涉的高峰阶段，因而很快成了一条地地道道的公理。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又引用了几十年，苏联报刊则一再刊印这段语录。作者谨在此略加解释，或许有助于澄清一种误会：“自由主义”的作者常常难于理解：为什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苏联理论家们能够一方面鼓吹和平共处，另一方面又根据两大阵营论，否定和平共处的一切价值。其实，解释起来倒也很简单：只须记住，在苏联人的心目中，有两种类型、本质上属于两个级别的和平共处。一种和平共处是脆弱的、不稳定的，相当于现阶段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和平共处”。另一种和平共处是完美无缺、暂时不可企及的，相当于各民族包罗于世界性苏维埃国家这样一个发展阶段⁸。只有这第二种共处才是“真正的”共处，而只有确信它终将到来才能使第一种共处（在理论上）变得可以容许，（在策略上）变得必不可少。

1922年12月30日，在宣告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强调了下述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只有当各国劳动者都溶合在全球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中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换言之，才能达到新式国际关系——它同目前资本主义残留阶段相比，具有本质上的优越性⁹。

这次讲话，同列宁一再重申的警告，并无本质差别。列宁说：“只要我们还没有取得全世界，只要我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还比资本主义阵营脆弱……，我们就应当善于利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对立。”¹⁰斯大林的前述讲话，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新的注释也毫无差别，因为这些理论家仍然把和平共处条件下的和平同“普遍持久的和平”加以区别，而后一种和平只有在各民族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才能实现¹¹。忽略这种差别，就等于把和平共处与和平主义混为一谈¹²。

我们作了这一段说明之后，便可重新研究“两大阵营论”对苏联外交政策各阶段的影响。诚然，共产党的党魁们，有时也把资本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根本对抗放在次要地位。但若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苏联对外政策中，两种制度的“不可调和性”只是宣传花招，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花招倒是那些虚情假意的演讲和欺世惑众的宣言，其用意是向西方人掩盖“两大阵营论”在制定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中一贯起着关键性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莫斯科的西方盟国就希望：在大战中同共产主义制度开始的合作，能大大超越战争时期而持久地延续下去。这时，斯大林正想掩盖他对东欧的覬覦，因而显然有意于加强自由民主国家的这种幻想。他通过安抚人心

的种种声明，企图使西方国家相信：根据苏维埃学说，和平共处同和平主义¹³是互不排斥的两个概念。于是，这位“各族人民的父亲”便在1946年9月，急急忙忙以肯定的答案回答了英国记者亚历山大·沃尔思提出的问题¹⁴。沃尔思问：

“您认为苏联同西方民主国家——尽管两种制度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之间有可能进行持久的友好合作吗？”

1946年12月21日，斯大林在接见艾略特·罗斯福时，同样作了这一类安抚人心的答复¹⁵。

1947年4月9日，斯大林接见了哈罗德·史塔森。史塔森提醒他说：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本人，过去一贯强调资本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不可能合作”。这位克里姆林宫主人在回答时故意不提“不可调和”论，他显然想令人信服：列宁和他本人一贯真诚地、全心全意地号召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实行“永恒”共处：

“资本主义制度同社会主义制度合作的思想，首先是列宁提出的。列宁是我们的导师……我们苏联人是列宁的学生。我们从来没有背离、而且永远也不会背离列宁的教诲……。这种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合作既是可能、也是值得欢迎的。¹⁶”

这些安抚人心之辞的虚幻性质，很快就暴露无遗了。

从1947年起，斯大林就意识到：他的这些声明，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造成某种思想混乱。许多人会弄不明白：正当共产党情报局谴责马歇尔计划的时候，为什么苏俄还继续（即使是策略性地）颂扬同资本主义集团的合作。因此，“两大阵营论”在苏联文件中正式恢复它应得的突出地位，这就不足为怪了。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宣言是恢复正统词令的典型例证。根据该宣言，世界再次似乎表现为两个无情争斗着的阵营：“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反民主势力阵营，其野心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并消灭民主力量；另一方面是反帝民主阵营，其要旨则是消灭帝国主义”¹⁷。

然而，这种新式的善恶对立说，并不妨碍斯大林在认为对他的计划有利时，对“不可调和论”作些许表面上的润饰。根据当时需要，他有时强调苏方进行合作的诚意，以便安抚那些不怎么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美国观察家¹⁸；或者与此相反，有时又强调资本主义阵营矛盾重重，以便削弱美国的地位。后者正是他在理论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¹⁹中所采取的态度。

斯大林在这篇著作中解释：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新的世界市场以及它们彼此的疯狂竞争，是比两大阵营间的基本矛盾更为强大的发展因素。实际上，斯大林之所以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是为了追求双重目的：一是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脱离华盛顿；二是促进西欧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斗争，加速各自“资产阶级”国家的瓦解过程。

因此主要应从策略方面估价斯大林为什么如此突出资本主义集团的矛盾。在理论上，他那两大阵营论的新版本，虽经润饰，却并无任何新奇之处。一方面，这是因为苏联理论家和领导人都从未否认过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世界“四分五裂”的观点；另一方面，因为斯大林也从来没有低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绝对不可调和性。

而且，1952年10月，马林科夫——斯大林最亲近的同

事——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两大阵营论最“经典的”说法²⁰。

因此，虽然有上述各种细别，看来“各族人民的父亲”关于“和平”共处的思想，在思想深处一直是牢固不变的，即：一场历史性斗争，不可避免会以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而告终。

这种关于同资本主义世界共处的如此不可调和而又如此正统的观点，是否也是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看法呢？

赫鲁晓夫时代

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尼基塔·赫鲁晓夫 1956 年 2 月 14 日在苏共二十大的演讲²¹，是走向改变列宁—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不可逆转的一步。这就意味着要大大降低“不可调和的两大阵营论”的调门。然而我们却认为：赫鲁晓夫虽然提出了三个新论点，来阐述马列主义关于对立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观点，但其中任何一个论点均未否认过去，即便这些论点说得有些模棱两可。这三个论点是：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革命不是不可避免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

关于战争不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思想，意味着可以避免毁灭性的核战争，但绝不是放弃解放战争，因为解放战争仍然是“正义的”。赫鲁晓夫说：在 1914 年和 1939 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很强大。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强大无比”，足以威慑“帝国主义”集团²²。但承认战争不是“注定要发生”，也就显然意味着并没有排除它会发生，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变幻莫测的不可避免

性²³。至少可以这样说：由于这个论点模棱两可，它的新颖之处就不突出了。苏联许多人士在二十大的发言，使得这种暧昧性质格外明显，所有这些讲话都似乎证实着不可避免性是“不可靠的”。

赫鲁晓夫讥讽了“资本主义阵营的头面人物”，“他们虽然还不肯承认如果发生一场新的世界性战争，资本主义必将被埋进坟墓……，但他们目前即已承认社会主义是不可战胜的”²⁴。苏斯洛夫表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总会有强大的力量来“粉碎侵略者，并最终埋葬战争和资本主义”²⁵。马林科夫的用词不那么富于诗情画意，他只是断言：“毫无疑问，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必将导致彻底摧毁资本主义体系”²⁶。

从这些言论中，看来很难发现“两大阵营不可调和论”有什么降调。某些善良的作者²⁷却解释说：关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论点，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经典式的”（如前一段所陈述的那样），认为赫鲁晓夫对于共处的看法不过是列宁、斯大林观点的修辞学变种而已。另一种理解是“创新的”，其结论恰恰相反，但推理过程却颇为巧妙。例如让·拉罗瓦²⁸就是这样说的：“如果有可能不通过战争来战胜帝国主义，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很讲道理，懂得战争是灾难性的；这也就意味着帝国主义能够自我改造。而如果帝国主义能够自我改造，那么它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而只是一种可以对之施加影响的政治派别……。它就不再是历史的对立面，不再是根据辩证法、应当通过社会的彻底变革予以战胜的人压迫人的根源……。”因此，让·拉罗瓦继续推理：如果以革新的方式

来实行这一论点，那么极而言之，共产主义本身便不再必要，因为“共产主义存在的基本根据，……便是……消灭自己的对立面……”。

这种分析尽管颇有诱惑力，但仍然不能令人完全赞同。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和理论家也一贯对赫鲁晓夫关于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论点作了“经典”而非“创新”的诠释。他们的各种分析无不强调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间斗争的不可调和性，也就是强调帝国主义“自我改造”绝不可能。这些人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日常词汇有精湛造诣，他们认为：“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平革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并不是依据某种假想，即似乎帝国主义会改变本性，而恰恰相反，是由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占据了绝对优势²⁹。

而且，正当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和平攻势”达到顶峰时，他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他用自己独特的形象化语言宣告：“谁要是以为我们会忘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教诲，那他就错了。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除非连河里的虾也学会了吹口哨……”³⁰

毫无疑问，人们会注意到，在这一类演说中，应当剔除“宣传”成分，而苏联的立场在实际上要更讲究分寸一些。无论如何，1956年3月18日《真理报》社论是这样表示的，作者说：

“存在着两种偏向：一种是政治侏儒所代表的偏向，他们只把共处当成权宜之计；另一种是天真汉的偏向，他们由共处推论出资本主义已变成和平使者。而在这两滩暗礁中间通过的，正是苏联共处政策的主线，它是为了一个长远的历史时期制定的，并以形势的新因素为根据，通过使集团与实力地位